

# 早期夏文化新探

袁广阔

目前学术界依据大量碳十四数据，基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晚期夏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的从何而来？什么是早期夏文化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缺乏，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一只处在争议之中。后来，新密新砦遗址其出土物中带有明显的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特征的文化，相关学者开始将探索二里头文化源头的目光放在了新密新砦遗址上。1979年新砦遗址的发掘简报发表之后，赵芝荃先生将煤山和新砦等遗址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遗存命名为“新寨期二里头文化”，认为“河南龙山晚期文化与二里头早期(一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其沿袭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新砦期为处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sup>[1]</sup>。新砦遗址“首批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有7个，其中，早段2个，晚段5个。其中早段的绝对年代早于公元前1850年，晚段的年代在公元前1850~前1680年之间”<sup>[2]</sup>。显然，新砦期文化的年代处于夏文化的中期阶段，早期夏文化应该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

近年来，随着河南新密新砦龙山城址的发现，以及巩义花地嘴遗址“新砦期”牙璋、玉璧和带神秘彩绘大型陶器的出土，“新砦期”考古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学术界对新寨期与二里头文化更加关注。特别是新砦期遗物中发现的来自于东方的文化因素。这些东方文化因素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来自河济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如新砦遗址的发掘者认为：“豫西新寨期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元素来自王油坊类型，如子母口瓮、子母口鼎、侧装三角形鼎足、V型镂空鼎足、深腹平底盆、圆钮和倒圈足钮折壁器盖等，占陶器总量的25%左右<sup>[3]</sup>。”可见豫东地区是一个主要线索，沿此思路，我们发现早期夏文化不仅局限于豫东，它与河济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 一 河济地区迟于龙山文化时期存在一个统一强大的文化系统

### 1. 分布范围

该文化分布范围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南麓和东麓的黄河、古济水两岸。西到焦作济源一线，东至山东菏泽聊城。北到安阳以北漳河一带，南达商丘、开封以南（图1），接近《汤诰》中的四渎范围：“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准，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 2. 河济地区龙山文化面貌比较一致，特征突出

龙山文化的主要面貌是陶质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最多，其次是磨光黑陶，磨光灰陶，泥质棕灰陶，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等。部分遗址有较多的夹蚌褐陶。纹饰夹砂陶以方格纹为主，篮纹、绳纹次之，泥质陶以篮纹为主、弦纹、刻划纹和指甲纹比较盛行。器形主要有罐、甗、鬲、鼎、甑、瓮、盆、刻槽盆、钵、圈足盘、豆、壶、觚、杯、

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先秦考古。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100048.

鬻、子口瓮、碗和器盖等。陶器特征可以分为两群，A群纹饰以方格纹、篮纹、绳纹为主。器形主要有深腹罐、大袋足甗、折腹斝、侧装高足鼎、甑、小口高领瓮、双腹盆、刻槽盆、钵、圈足盘、豆、杯、碗和器盖等，是河南地区龙山文化常见陶器。B群装饰以素面磨光为主，纹饰有弦纹、刻划纹。器形主要有素面深腹罐、圈足盘、壶、鬻、子口瓮、折壁器盖等，是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常见陶器，可称之为泛东方文化系统。目前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安阳后岗、汤阴白营、辉县孟庄、菏泽安丘堽堆、杞县鹿台岗、永城王油坊等（图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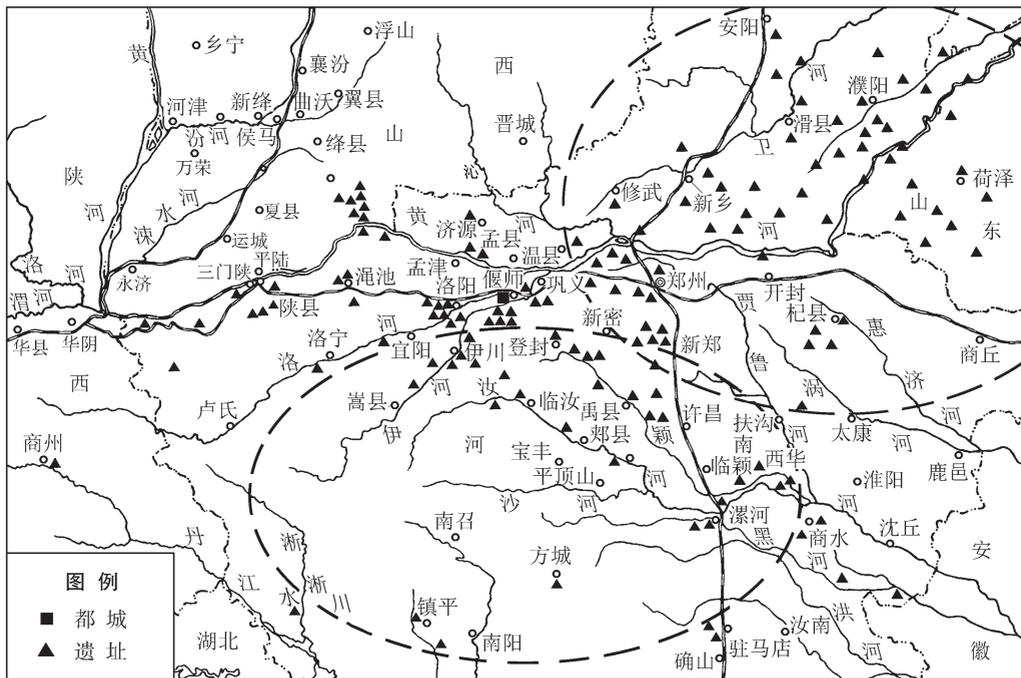


图1 后岗二期文化（右上虚线勾画区域）和煤山类型文化（左下虚线勾画区域）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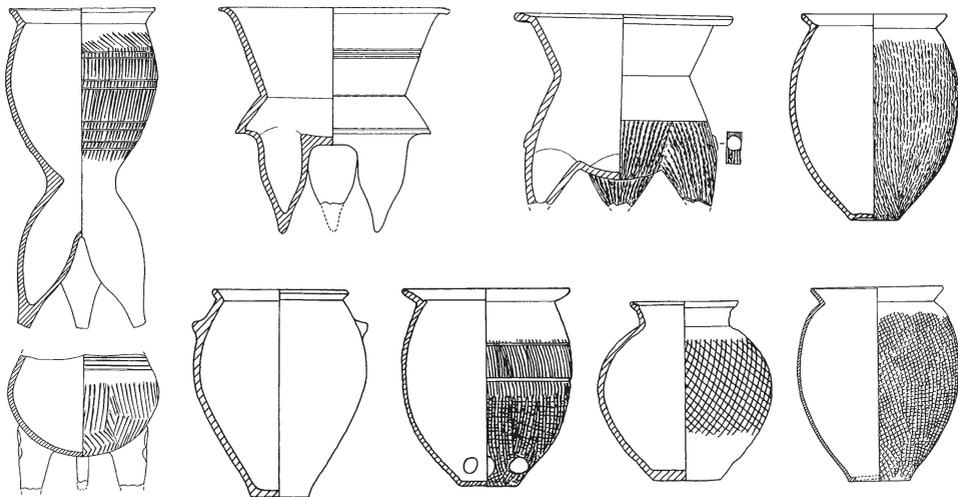


图2 辉县孟庄出土A群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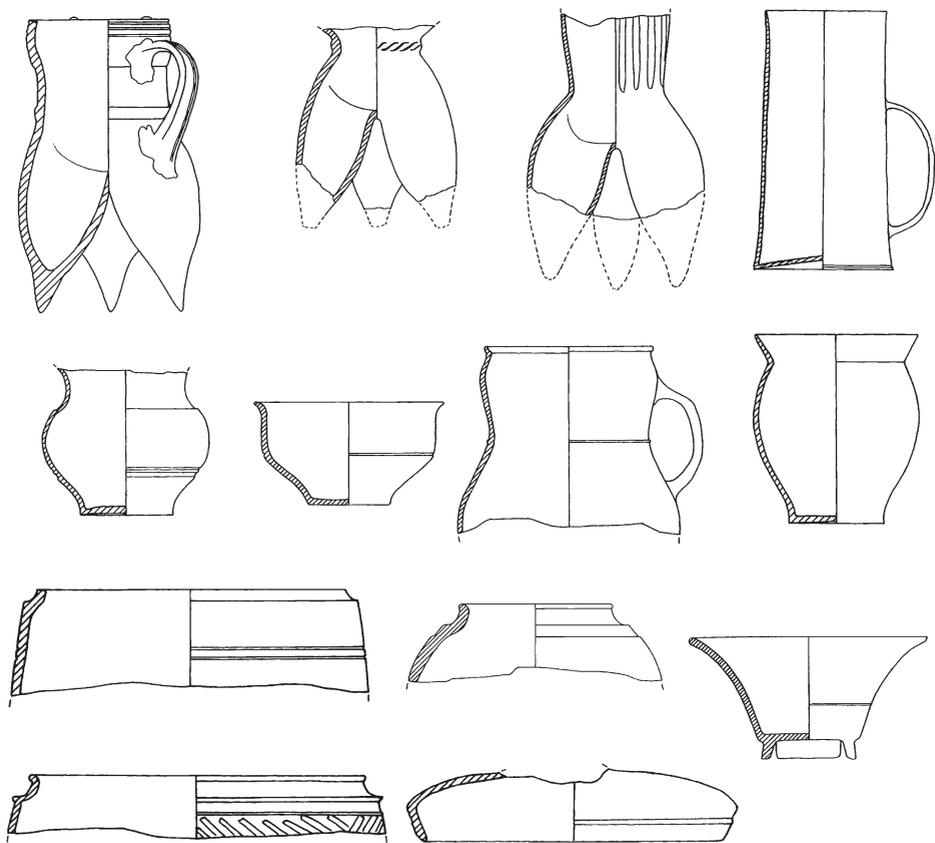


图3 辉县孟庄出土B群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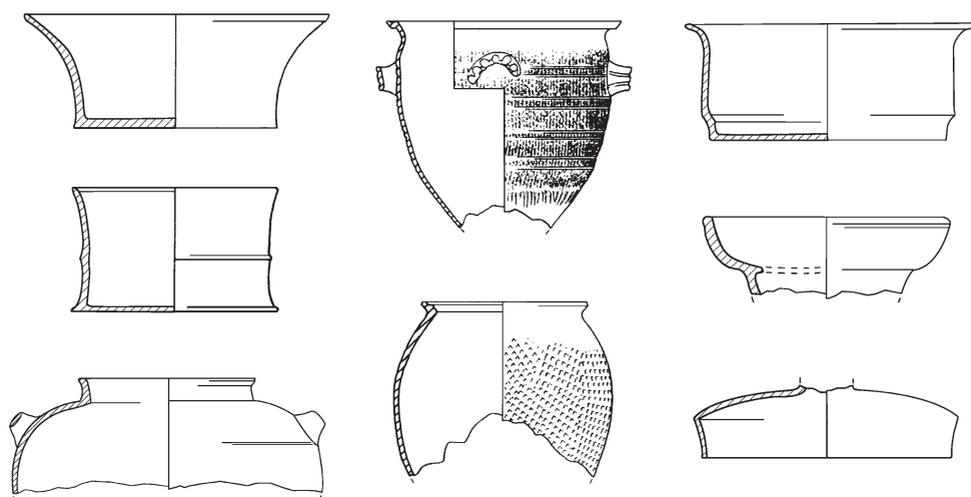


图4 濮阳崩瓞台出土AB群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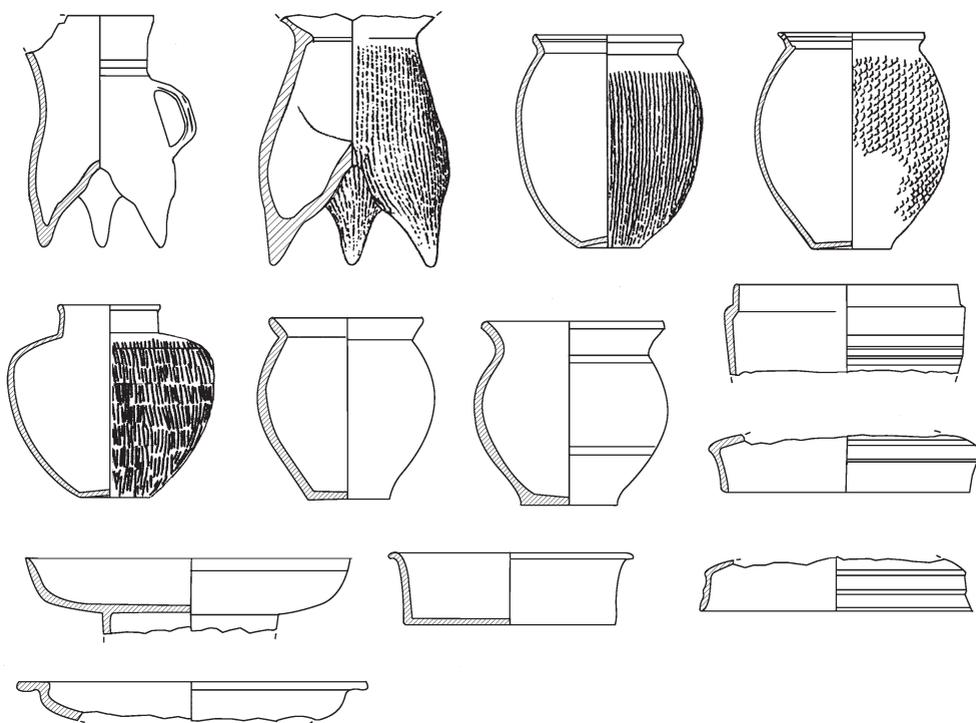


图5 菏泽安丘堽堆出土AB群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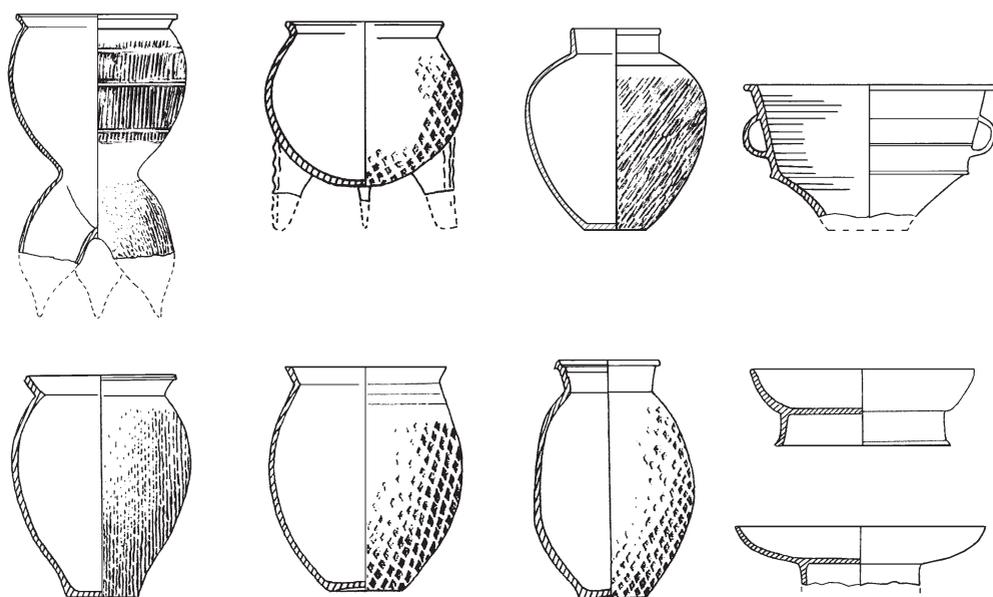


图6 杞县鹿台岗出土A群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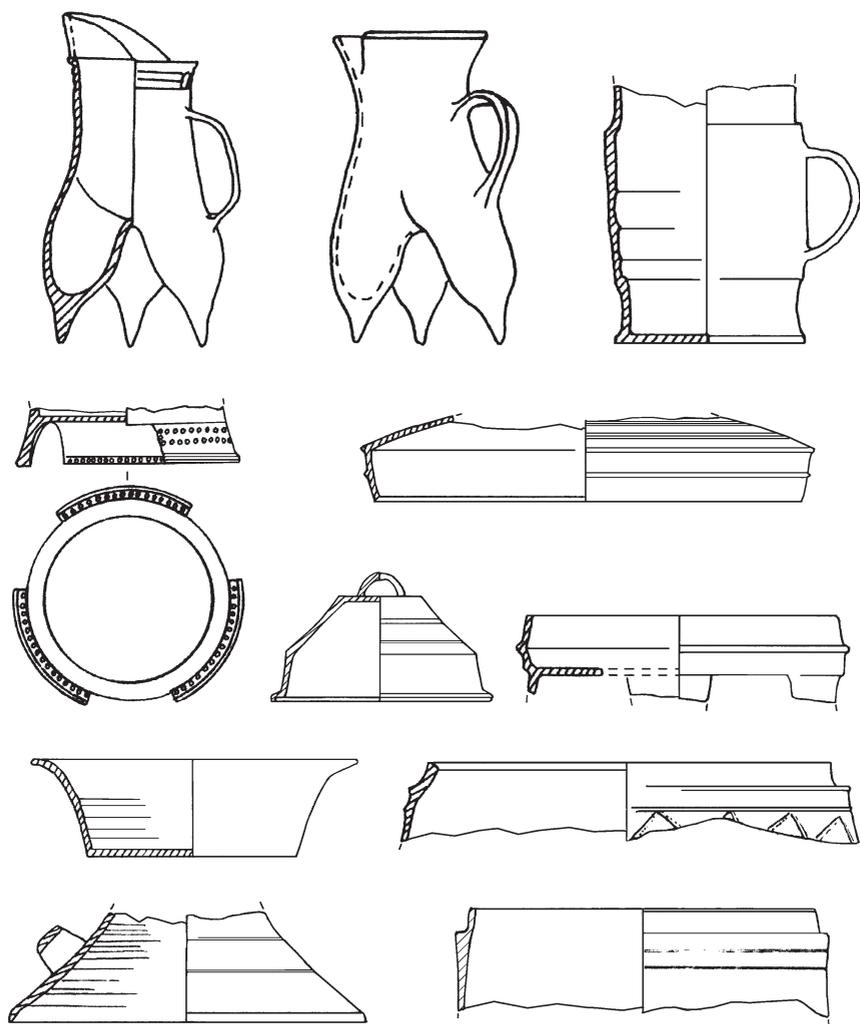


图7 杞县鹿台岗出土B群陶器

新砦期颇具特色的遗物如甗、子母口瓮、袋足鬻、侧装三角形高足鼎、平底盆、折壁器盖等多来自河济地区B群，少数来源于A群如甗，但需要说明的是A群中多数陶器在本地存在，是否为外来判断比较困难。

### 3. 遗址之众多

本地区遗址众多。河南山东龙山文化城址也多分布于该地区。仅濮阳县有20余处，滑县有遗址30余处，加之安阳、新乡、菏泽、商丘、开封、焦作等，遗址将有数百处。这里因位于古河济之间，今天这一带整个都是平原地形，属于由黄河冲积而成的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还有大量遗址还掩埋在多次泛滥的黄河淤沙下。

### 4. 聚落层级明显

濮阳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时代聚落最为突出，已构成了庞大的聚落群，是濮阳古代文化的特色和核心，可以分出三个层次，显示了一个“都、邑、聚”结构齐全的古国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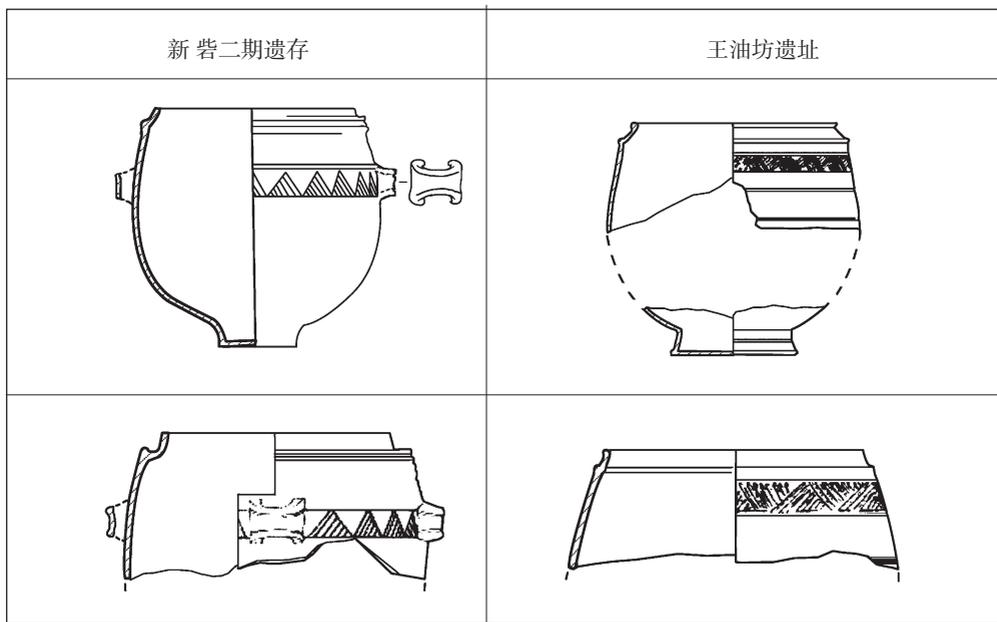


图8 新砦与王油坊子母口瓮比较

在濮阳的存在。

第一层次是以高城为中心而围绕分布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庞大的聚落群，位于五星乡的高城遗址，其面积约为100万平方米以上，应处于龙山时期的核心地位，其面积在河南同时期中最大。

第二层次，是围绕高城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城址，形成次中心的龙山文化遗址群。北部有戚城遗址，戚城是春秋时期卫国边陲军事重镇，城内面积14.4万平方米，龙山时期是高城的重镇。

东南是咸城遗址，是高城东南部保存较好的龙山遗址，在东周时仍然使用。咸城遗址位于该县梁庄乡咸城村东北约1公里，当地群众称之为“霸王台”，总面积21万平方米。

西南是文寨遗址，是高城西南部保存较大的龙山遗址，位于濮阳县子岸乡，面积40万平方米。该遗址周边有众多的小型遗址。

第三个层次是围绕戚城、咸城周边的大量的小型聚落。它们目前在濮阳有近30处，滑县有30余处，内黄、范县都有。以戚城为中心，东南又有程庄、皇姑屯、银岗等遗址等组成二级和三级聚落群。以戚城城址为中心，周围有金桥、蒯贲台、铁丘、马庄、西门里等组成二级和三级聚落群。西南是以文寨遗址为中心，与滑县与濮阳邻近区的近30余处聚落，组成了一个二、三级聚落群。

该地区第二个层级的遗址有辉县孟庄城址<sup>[4]</sup>，沁阳西金城<sup>[5]</sup>、温县徐堡<sup>[6]</sup>，安阳后岗等等<sup>[7]</sup>，周围也分布有众多的三级聚落。

## 二 后岗二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1. 文化的命名

因该文化最初由梁思永先生1931年发现于安阳后岗遗址的第二文化层，故又称之

为“后岗二期文化”。这种文化普遍发现于豫北地区，因此依照考古学命名的惯例可称之为后岗二期文化。真正提出这个命名的是安志敏先生。他首先把河南地区龙山文化遗存根据其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以表示它是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一种变体。他以河南龙山文化第一次的发现地命名，称期为“后岗二期文化”<sup>[8]</sup>。正如郑杰祥先生所指出的：“安先生所提出的这些新的命名，在当时的情况下较好地概括了这类文化的分布地域和内涵，推动了这方面的考古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很快被学术界所广泛采用，迄今一直被沿用着。”<sup>[9]</sup>

### 2. 后岗二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

后岗二期文化普遍发现于豫北地区，梁思永先生指出：“地理上处于山东沿海区和豫北区之间的城子崖，有着一批似乎是文化接壤区所生产的陶器”<sup>[10]</sup>。今天来看这是一个前瞻性的认识。峦丰实先生将山东地区西部的龙山文化分为城子崖类型，指出：“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和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后冈类型，均分布于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之上。两类型地域毗邻，时代相当，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与影响较为频繁。因之，双方在各自的文化内涵中包含有若干对方的文化因素。”<sup>[11]</sup>这一认识十分正确，表明当时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之间的文化的交流的存在。从菏泽安丘堽堆遗址出土的文化特征分析，在龙时期山东菏泽一带主要属于后岗二期文化。

### 3. 与豫东王油坊类型的关系

王油坊类型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山东西部和江苏北部。河南境内已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商丘坞墙<sup>[12]</sup>、永城王油坊<sup>[13]</sup>和黑堽堆<sup>[14]</sup>，鹿邑栾台<sup>[15]</sup>等。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台”或“堽堆”上，一般遗址的面积不大。陶器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蚌壳末的棕或褐陶数量也不少，有的单位其比例占总陶片的30%。夹蚌陶器类很少，多为罐和碗等，皆为素面，特征与辉县孟庄遗址一致。纹饰以篮纹、绳纹为主，方格纹较少，方格纹有长方和正方两种，纹饰较浅。此外，还有少量平行竖线纹、指甲纹、附加堆放、弦纹。磨光陶的比例也不少。器形有罐、鼎、甗、碗、瓮、豆、圈足盘、杯、盆、器盖等，陶器特征与后岗、白营等遗址特征相同。因此，戴向明则认为王油坊类型“基本不出后岗二期文化的范畴”<sup>[16]</sup>。

### 4. 对新砦期文化的影响

后岗二期文化在龙山早期迅速强大起来，对郑州地区的影响可以分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郑州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当来源于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这已经有地层关系和文化特征的承袭关系证明。在大河村和点军台遗址，都发现两者相叠的地层，且这两个遗址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面貌，亦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继郑州区第一期大河村五期文化之后是占马屯一期文化，二者衔接的比较紧密。但到第三期中出现缺环。多数器物无先后演变关系。而很多器物则同孟庄遗址的特征接近，这些相近的陶器在孟庄龙山早期早已存在。

郑州占马屯、杓兑王等遗址内发现有较多同孟庄龙山中期一样的文化因素，如都有一定数量的夹砂褐陶以及乳钉纹的夹砂褐陶罐、大袋足甗、釜形甗等。杓兑王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所出夹砂黑陶釜形甗、深腹罐、细柄豆、圈足盘、钵、器盖都可在孟庄遗址中找到渊源。另外杓兑王遗址中出土的成组契点纹明显是受孟庄类型的影响。上述分析表明，以孟庄遗址为代表的后岗二期文化遗存，在龙山中期阶段已越过黄

河，来到了郑州地区。换言之，我们认为在龙山中期，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面貌是黄河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向南推进的结果<sup>[17]</sup>。

第二阶段对新砦期文化的影响。豫中地区从新砦期开始，新砦和花地嘴等遗址<sup>[18]</sup>，出土有相当一部分陶器如大口深腹罐、袋足甗、冲天流鬻、子母口瓮、侧装三角形鼎足、深腹平底盆、折壁器盖等东方因素的陶器不仅是受到了后岗二期文化的影响，其中来自东部的影响如豫东王油坊等遗址的影响更强一些。

### 三 对中原地区文化格局的认识

龙山文化早期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可以分出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遗址三期文化、大河村五期、孟庄二期文化等。大汶口晚期文化进入豫东地区并形成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称为尉迟寺类型<sup>[19]</sup>（有学者称为颍水类型<sup>[20]</sup>或段寨类型<sup>[21]</sup>）。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最为强大，它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陕西交界地区。目前已经发掘的重要遗址有襄汾陶寺、芮城清凉寺、陕县庙底沟，灵宝涧口、澠池仰韶村、新安西沃等。该文化当来源于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因此出现一些具有仰韶文化的特征的陶器如小口尖底瓶，新出现具有龙山时代特征的罍、釜灶等新器类，并大量使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特征。主要遗迹有圆形袋状灰坑、房基、陶窑、墓葬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泥质灰褐陶为主，制作有手制和轮制两种，以手制为主。手制陶器大都用泥条盘筑，口沿多经轮修。部分陶器使用接底法，即制坯时，分别制作器身和器底，然后再进行接合。纹饰以篮纹为主，次之为绳纹，并有少量附加堆纹、划纹、方格纹。主要器类有罐、鼎、灶、罍、盆、刻槽盆、碗、杯、豆、瓶、钵、器盖等。从庙底沟和灵宝涧口遗址的遗存分析，该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该文化向东一直影响到洛阳和郑州西部一带。洛阳盆地流行庙底沟二期文化常见的折腹罍、夹砂深腹罐、斜腹平底盆（折腹）、小口高领罐等器物。

在河南东北部辉县孟庄孟庄二期文化开始发展，它主要分布于太行山南麓，北至林州，南到武陟，西至焦作、沁阳，东过新乡至濮阳以西地区。这里位于太行山南古黄河以北相对封闭的地区，是太行山前一道泉水溢出带，系沼泽湖泊溪流密布的地区，这里渔猎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十分适宜人类生存。因此在卫河中上游地区分布着较为密集的龙山文化遗址，已发掘的遗址有新乡洛丝潭、获嘉李大召、辉县孟庄、修武义井等。其中孟庄遗址发掘面积最大，遗物最为丰富，为本类型的典型遗址。第1段：典型单位Ⅷ区T69H191、T39H102、T151H174、T172H295为代表，典型陶器为罐形鼎、袋足甗、袋足罍，夹蚌陶深腹罐、夹砂褐陶深腹罐、深腹罐、小口高领瓮、尊、曲腹盆、刻槽盆。瓮、大口罐腹部为圆弧状；豆柄又矮又粗。第2段：主要器类为深腹罐、素面罐、高领瓮、大口罐、豆。深腹罐、甗体较瘦；夹蚌素面罐平底较大；大口方格纹罐、绳纹深腹罐宽沿，颈内束；罍裆较宽且底部呈弧状；圈足盘宽沿浅腹。

这一时期，尉迟寺类型以豫东皖西北为中心向西也进一步发展。辐射范围甚广，豫中和洛阳盆地都有遗迹和遗物发现，如偃师二里头的平底尊、筒形杯、大口尖底缸，滑城遗址M1出土背壶、高柄豆和觚形杯的大汶口文化器物组合，墓葬中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出现说明大汶口文化人群的迁徙已到达中原腹地；后段，此类文化因素直接辐射至豫西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灵宝涧口和垣曲古城东关都可见到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sup>[22]</sup>。大河村五期文化是豫中为核心的仰韶文化晚期大河村类型在龙山时代早期的继

承者，但到龙山早期后段已逐渐淡出。颍河流域谷水河遗址三期受到了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双重影。

但到龙山文化时期，孟庄孟庄二期文化开始发展为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庙底沟二期文化被孟庄孟庄二期文化挤出洛阳盆地，中原形成了两大文化体系，即分布于嵩山以南地区的煤山类型文化和分布于河济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

后岗二期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最多，其次是磨光黑陶，磨光灰陶，泥质棕灰陶，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等。部分遗址有较多的夹蚌褐陶。纹饰夹砂陶以方格纹为主，篮纹、绳纹次之，泥质陶以篮纹为主，弦纹、刻划纹和指甲纹比较盛行。器形主要有罐、甗、甗、甗、瓮、盆、刻槽盆、钵、圈足盘、豆、壶、觚、杯、鬲、子口瓮、碗和器盖等。陶器特征可以分为A、B两群。流行罐、甗、甗的组合和泛东方的大平底盆、圈足盘、子口瓮组合。从考古材料看后岗二期文化对新砦期文化，以及二里头的的影响很大，并且对外辐射性影响也很大。

颍河流域谷水河三期文化发展为煤山类型文化，主要分布于嵩山以南的伊河流域、颍河中上游地区和沙汝河流域。陶器流行鼎、罐、双腹盆、甗组合；它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联系紧密，如具有南方文化系统因素的平口鬲、叶脉纹的罐等。

#### 四 结论

后岗二期文化为早期夏文华的确立和认识意义重大。从世界范围观察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等古国的文明都是发生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的下游地区。因为这些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故农业往往很发达。中国也没有例外，后岗二期文化正是在黄河和济水下游、河湖交织，土地肥沃的地区。

《史记·夏本纪》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戡戈氏。”郑介祥推断：“这十二个姒姓方国连同一些异姓方国共同构成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夏王朝国家政权，其中十一个姒姓部族方国与夏朝中央王室既存在着血缘上的宗法关系，又存在着政治上的分封关系和经济上的贡纳关系，从而与夏中央王室密切连累在一起，因此它们的分布地域自然构成了夏王朝的领土范围。”<sup>[23]</sup>这些方国除彤城氏，褒氏、冥氏文献记述的地点不确外，其余都可在山东、河南东部找到线索。

夏王朝见于文献的都城，除其晚期都城斟寻在巩县（偃师二里头）外多数在河济一带后岗二期文化的范围内（表1），这与文献记载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兴起，许多古代著名氏族在这一带活动，是完全相一致的，也与考古发现这里龙山时代的遗址星罗棋布，比较各地最为密集的状况是相吻合的，从而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早期国家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河济地区从地理上看，是内陆文化与滨海文化的一种关系，河济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是中原文化和海岱地区东夷文化相互融合形成的。大约在距今4000年之前，率先步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国家阶段，其优于周边各区的文化核心地位逐渐得以确立。通过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研究证明，河济地区已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四方辐辏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表1 夏代都城一览表

都邑	居者	现在地名	考证
阳城	禹	开封	《世本》：禹居阳城，在大梁之南
帝丘	相	濮阳	杜预注：帝丘，东郡濮阳县，相是夏王朝第四代国王
斟灌	相	范县	《水经·河水注》：“浮水故渎又东迳卫国县古城南古斟灌
斟灌	相	范县	《水经·河水注》：“浮水故渎又东迳卫国县古城南古斟灌
老丘	宁	开封东	《春秋地名考》老丘，在今河南陈留城北
西河	胤甲	安阳	《古本竹书纪年》胤甲，居西河
斟鄩	桀	巩县（偃师二里头）	《括地志》：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 注 释

- [1] 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 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 [3]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 [5] 山东大学考古系2008年沁阳西金城遗址发掘资料。
- [6] 郑州大学考古系2008年温县徐堡遗址发掘资料。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 [8] 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 [9] 郑介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 [10] 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 [11] 峦丰实：《论城子崖与后岗类型的关系》，《考古》1994年第5期。
- [12] 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商丘县乌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2期。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14] 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垆堆曹桥三处小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 [1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 [16] 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 [17] 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 [18]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
- [19] 峦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
- [20] 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 [21] 段宏振等：《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 [22] 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第158~16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23] 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